

中國特色的都市公共空間與地方文化自主性：評介
王笛的《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
1950》及 *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 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 1950–2000**

Urban Public Space and Local Cultural Aut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view of Wang Di's *The Teahouse: 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
(Chinese Version) and *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 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 1950–2000*

劉世鼎**

Shih-Diing LIU

2019年春節期間，我隨家人回成都過年，心裡盼著重溫成都輕鬆悠閒的氛圍。到了成都，發現路上冷冷清清，大多數的商店都關了，原來許多人都回老家過年了。我們住的地方附近有幾家街邊茶館，過年期間照常營業。除夕那天茶館裡還有人在喝茶打牌打麻將。初一一早我們到人民公園轉轉，裡面的露天茶館坐滿了人，有情侶、有一家子、有外國人，在難得的冬陽下喝茶聊天嗑瓜子，或享受「採耳」（挖耳屎）的服務。茶館旁有個小魚池，孩童和家長拿著一根綁著小奶瓶的餵魚器，逗著肥大的鯉魚玩。由於這個喝茶區大致是露天的，跟整個公園基本上是相通的，人群來來往往，雖然有些嘈雜，卻也充滿了生活的氣息和民衆的活力。

投稿日期：2019年3月4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年4月17日。

* 感謝《文化研究》編委會及評審的寶貴意見，以及楊竹馨的協助。

** 澳門大學傳播系教授。

電子信箱：sdliu@um.edu.mo

成都這個二線城市雖然有大量的西式咖啡廳和快餐店等資本主義都會消費空間，但茶館作為一個傳統的大眾休閒、消費、聚會、聊天的社會空間和場所，卻存在已久，成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難以被取代。成都茶館不同於臺灣式的泡沫紅茶店（服務資本主義都會快餐式的節奏），類似於港澳的茶餐廳和西式咖啡廳和酒吧，是社會關係和社會網絡的物質空間，是可以坐下來慢悠悠地培養感情的情感空間。但成都的茶館不僅僅是聯絡感情之地，更是提供人們重要的休閒娛樂的場所和社會空間，其發展、歷史、主體和文化都是內在於成都的城市肌理當中。那麼，成都茶館能否提供一個理解當代中國歷史、現代性和公共文化的窗口？王笛的兩本著作——2010年出版的《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及其延伸著作*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 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 1950–200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從文化史和城市史的角度細說成都茶館在20世紀所經歷的歷史變遷，從而折射出當代中國都市公共生活和大眾文化的興衰。這兩本書對於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來說，或能提供一個帶有歷史厚度的參照點。

王笛的研究大約是幾年前進入我的視野的。當時我在澳門的一家書店裡翻到他寫的《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衆與地方政治，1870—1930》（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這本書是根據他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博士論文所改寫的，其凸顯的「街頭文化」視角在大陸眾多採取官方或精英視角的學術著作裡顯得相當獨特。他從文化史的角度探討清末民初成都街頭這一特定的民衆空間，討論了一系列議題，包括公共空間的劃分、民衆日常生活文化，國家對民間活動和大眾娛樂的介入和控制，各種社會和政治勢力如何在街頭進行鬥爭，地方民衆如何維持傳統生活方式及自治的社會形態等等。通過描繪「街頭文化」的變遷，這本書揭示了國家、地方菁英與民衆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如果說《街頭文化》是王笛對成都這樣一個內陸城市、把街頭作為一個公共空間及蘊育地方文化場所的第一個系統性的考察，他後來陸續出版的《茶館》和*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可以被看作與其共同構成了「成都三部曲」。後來王笛來到澳門大學歷史系任教，成了我的同事，我們辦公室離得比較近，聊天得知他是土生

土長的成都人，就不難理解為何這幾本書對成都有如此生動細膩的描繪。¹

如果說《街頭文化》包含的空間維度比較寬泛，後面兩本書則聚焦在茶館這一特定的場所。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茶館提供王笛一個更具體的論述焦點，來訴說20世紀中國現代化在微觀層次產生的效應。即便如此，後面兩本書仍延續了《街頭文化》裡對空間、文化、政治與民衆的興趣。這幾個關鍵詞也是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雖然王笛並非出身於英國文化研究的訓練，但可以看出湯普生(E.P. Thompson, 1924-1993)《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對他的影響(王笛 2009: 127)。總的來說，這兩本書都試圖從「民衆」角度和「底層」歷史觀看待中國現代化過程和後果，以及民衆如何回應、如何為生存而鬥爭，主軸是茶館在現代化的演變過程中如何「被國家和社會改良所攻擊和改造。」(王笛 2010: 30)。這個民衆視角，某種程度上是回應主流中國歷史研究側重領導人、皇帝、名人和精英的偏頗。他在《街頭文化》裡就問道，下層民衆是否能發出他們的聲音、能不能代表自己？如果說王笛有什麼特定的對話對象，應該說是對於中國歷史研究偏好宏觀歷史和精英的批判，從而展開對於底層人民的文化研究。在他看來，中國式的宏大歷史書寫有一個特定的政治傾向，就是從上而下以民族、國家為視角、不重視普通民衆的歷史經驗，而這一傾向與長期以來統治者的需要不無關聯。這種「講大歷史，歷史要為治理國家、為統治服務，提供給執政者吸取經驗教訓，並為他們提供借鑒」(王笛 2018a)的史學觀，也導致民衆和他們的生活

- 1 本文焦點不在於成都茶館的文化特定性，而是側重其概念及分析框架。有關中國大陸茶館文化的區域差異，可參考：王笛。2019/01/28。〈成都為什麼茶館那麼多？〉。<https://www.hksilicon.com/articles/1727575>。(瀏覽日期2019/3/22)；葛維櫻。2018/05/01。〈巴蜀茶館：一碗茶裡的市井與歡愉〉，《三聯生活週刊》。<http://www.dongri.com.cn/3115.html>。(瀏覽日期2019/03/22)
- 2 本文對於「公共空間」一詞的使用——包括王笛書中的用法——所指的主要是在地的物質空間如何轉化為中介中下層階級社會關係與實踐的空間，並非源自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式的、精英主義的、以歐洲經驗為基礎的「公共領域」概念範疇。自1990年代以來關於中國究竟有沒有哈伯瑪斯所說的公共領域的論述及辯論已成形，本文不打算展開討論。有關中國史及文化研究中對如何使用、處理這些分析概念所引起的爭論，可參考：Wang Hui et al.(1994)、金鵬濤與劉青峰(2003)、鄧正來與J.C.亞歷山大(1999)。

被排除在正統歷史書寫之外：

中國的歷史書寫，從根本上看，可以說是一個帝王將相、英雄豪傑、知識精英的歷史，因為我們相信，只有寫他們，才能建構有關民族和國家命運的宏大敘事，才能體現史學家的使命感。我們事無巨細地瞭解帝王將相、風雲人物的一舉一動。他們當然比一個默默無聞的普通人對歷史更有影響，但問題在於，我們所面對的是佔總人口99%以上的這些小人物，他們每天也在創造歷史，只不過創造的方式不同罷了。我們不關心他們的情感、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對世界的看法、他們的遭遇、他們的文化、他們的理想，因為他們太渺小，渺小到難以進入我們史家的視野。因此，我們所知道的歷史是一個非常不平衡的歷史，我們把焦點放在一個帝王將相、英雄豪傑馳騁的小舞台上，而對舞台下面千變萬化、豐富多彩的民眾的歷史卻不屑一顧。在帝王和英雄的歷史書寫下，我們把希望寄託在歷史上屈指可數的明君賢相、精英人物身上，視個人如滄海的一滴水，可有可無，似乎在歷史上沒有留下任何蹤跡。（王笛 2009：139）

在他看來，這種以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家為中心的歷史敘事模式的最大問題，是將普通民眾視為「無意義」的，也正因為對精英與國家主義式的歷史觀的不滿，讓他逐漸轉向微觀史的取向，希望能讓歷史書寫更貼近底層，發現其「歷史和文化的有意義的內涵」（*ibid.*: 140）。他所強調的「微觀」，是將「小人物」的歷史放在顯微鏡下（王笛 2018a），聆聽他們的聲音。但與歐洲微觀史不同，在中國關於底層民眾的資料非常欠缺。³他非常推崇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1978年出版的《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這本書最獨特之處就在於，當主流的史學研究還「集中在上層、國家、政府、政治、精英這些方面」時，史景遷就選擇以山東一個貧困農村底層人的生活為中心來訴說歷史（王笛 2018b）。

從理論取向來說，王笛的微觀社會文化史確實是受到文化大眾與底層文化研究的影響，特別是新文化史和大眾文化史的啟發。不同於過往，這個取向以普通人作為研究對象，並強調通過普通人的經驗、故事去訴說歷史（*ibid.*）。在一篇題為〈新文化史、微觀史和大眾文化史——西方有關成

3 王笛（2018a）認為這與古代歐洲（特別是意大利）宗教裁判所留下了大量審訊紀錄有關。

果及其對中國史研究的影響〉的文章中，王笛(2009)明確指出他自己的研究屬於西方史學界「文化轉向」的一部分，其理論淵源可追溯到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的文化霸權理論及南亞底層研究學派。這篇文章指出了史畢娃克(Gayatri Spivak)、古哈(Ranajit Guha)及史考特(James Scott)底層研究的影響，特別是對於底層「聲音」的重視：「在研究下層和邊緣化的人群時，我們都會面臨怎樣發現他們自己『聲音』的問題，因為在傳統的歷史資料中鮮有關於他們的真實記錄。即使我們能找到一些相關信息，也幾乎都是由精英們撰寫的。」(ibid.: 135)。

這也就是為什麼《街頭文化》反其道而行，耐心帶著讀者進入民衆的微觀世界，讓我們看到在現代化過程中被排斥在歷史之外的人：小販、工匠、乞丐、流氓、民間藝人、勞工、女性、遊民、妓女嫖客等等。⁴他的後兩本書所聚焦的茶館同樣是社會底層人聚集之處，因為茶館對窮人特別重要，許多人依靠茶館為生，也是他們能消費得起的娛樂（王笛 2010：441）。這兩本書描繪了普通市民的傳統生活方式、日常活動、娛樂，以及茶館經營者和藝人的謀生策略，如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為了能掌握當時人們的文化經驗，王笛從各種文類尋找資源，各種檔案文獻、報紙、遊記、私人記錄、甚至文學作品都提供了寫作素材。

一、都市公共空間的自主性

這兩本書主要核心問題是成都的公共（同時也是民衆文化的）空間的自主性和發展活力，在20世紀經歷了什麼變化？這些變化，又如何與政權

4 王笛的兩本書並沒有觸及與成都茶館有關的另一個長期被排斥在歷史之外的群體——同性戀。根據魏偉(2007)的研究，由於歷史的文化多元性、道教推崇的逍遙自由、以及重視休閒娛樂的傳統，成都的在地文化對同性戀群體特別包容，同性戀活動也更為公開。相較於酒吧、健身房及桑拿等社交場所，茶館成為同性戀群體（俗稱「飄飄」，意味著在不同空間移動聚集的社會存在）「集體亮相、公開表達性向的場所。」(ibid.: 14)。成都「喝茶的習俗和茶館裡相對自由的氛圍，」，魏偉觀察到，「讓「飄飄」的性別差異在茶館這個公共空間中得到了公開的表達。」(ibid.: 15)。

更迭、國家現代化方案及其政治產生關聯？相較於過去都市史研究偏重上海等沿海地區(Wang 2018: 21)，成都作為內陸城市的一個典型及西部地區的重心，或能提供一個關於都市社會空間秩序如何重構的不同視角。由於「中國城市的公共生活長期為城市史學者所忽視」（王笛 2010：5），這兩本書可以被看作是一個填補。⁵

對王笛而言，一個自由開放的空間是公共生活最基本的要素，但這個空間卻要面對來自國家與地方政治的干預。這兩本書以平易近人的文筆描繪了成都微觀空間和環境的轉變，特別是當國家試圖對公共空間的使用進行控制時，民衆如何為其生存空間和生活方式鬥爭。在不同歷史時期，都市日常空間被不同主體利用來進行不同的活動，甚至進行政治反抗。王笛所選擇的茶館，在中國已有數百年歷史。在他看來，晚清以來，茶館「提供了研究下層民衆活動的一個重要空間」（王笛 2010：7；Wang 2018：91）。茶館作為一個公共空間「對各個社會階層、集團和組織開放」（王笛 2010：157），不分階級、地位、年齡、性別都「相對平等」（*ibid.*: 169）。它在成都的日常公共生活中起到多重作用：作為地方重要的經濟組織及小商戶和底層人賴以生存的空間給民衆提供日常生活服務、作為街坊社會互動交流溝通及娛樂場所、作為解決紛爭之地、作為政府和社會不同勢力極力想控制的空間(Wang 2018: 19, 23)。茶館中介了複雜的社會人際關係，提供了地方社會自治的物質空間，並承載了中國革命與現代化過程所產生的內在與外在的多重矛盾。

我覺得這兩本書最有意思之處，在於把茶館作為理解中國革命和現代化如何改變日常生活、如何對地方文化產生作用的一個窗口。王笛的主要興趣在於物質空間在政權更迭過程中，怎樣演變成為一個社會與政治空間（王笛 2010：427）。他總結出茶館存在三種政治：平民、精英、國家

5 某種意義上來說，王笛的研究延續了他博士指導老師羅威廉(William Rowe 2005, 2008)關於漢口的一系列著作，他所強調的跨學科視角也為王笛的研究提供了基礎。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王笛的城市史更側重大眾文化面向，也更接近文化研究的關懷。

(ibid.: 412)。在傳統社會，由於國家權力很少深入到地方和鄰里，茶館始終是信息交流和社會活動的中心，也是地方政治和解決爭端的空間(ibid.: 13, 327-329, 347, 384)。隨著晚清政權內憂外患的危機感，茶館也難以避免成爲改良的主要目標：

晚清以降，現代化潮流衝擊整個中國，隨之而來的城市改良運動，便是按照一個統一的模式來改造城市，這個模式包括整修街道以改進交通，重建城市空間以創造「現代」的城市景觀，規定衛生標準以防止疾病，清除街頭乞丐以推進「進步」的城市形象，制定各種規章以維持公共秩序，改良休閒娛樂以「啓蒙」大眾，發揚愛國精神以培養新的國家認同，強化政治以推動國家控制等等。(ibid.: 12)

改良運動對茶館的公共角色帶來一波又一波衝擊，國家以「色情」、「迷信」、或維持公共秩序的名義，控制茶館戲曲娛樂活動和公共空間的使用(ibid.: 43)。原本茶館最吸引人之處，在於人們可以自由交談批評時事(ibid.: 79)，但到了民國時期，連茶館閒聊也受到國家的監控干涉，使得人們無法在茶館表達不同的政治觀點(ibid.: 403)。茶館也在戰爭中起到重要作用。對日抗戰時期，「茶館被用作進行全民動員和戰時宣傳的場所，日常生活與國家政治的聯繫之緊密達到史無前例的地步。」(ibid.: 43)。隨著茶館成爲政治宣傳的舞台，文明、愛國的大敘事成爲茶館的標語。雖然「在茶館裡，民衆力圖表達他們的政治聲音，進行政治參與，但又被精英和國家的話語霸權和國家機器的暴力所壓制。」(ibid.: 412)。

在*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一書中，王笛將他對於國家和菁英如何塑造公共空間的問題意識帶到新中國成立之後。歷經革命、軍閥混戰、國共內戰，茶館的公共性在共產黨取得政權後面臨空前的危機。他詳細描繪了1949年後共產黨如何強制接管地方經濟資源，以致於成都街頭小企業衰退導致公共空間萎縮(Wang 2018: 33, 209)，以及國家如何嚴密控制休閒場所和公共生活(ibid.: 13, 19)。在政治運動高潮期間，政治恐懼使得人們逐漸從茶館撤退到家中，避談時事(ibid.: 92)。受限於這段時期的史料記載，這本書更聚焦於茶館經營者，用了很大篇幅描述茶館產權變化及公會的組

織演變，如何成為政治宣傳的工具，無法像過去一樣保護茶館的利益(ibid.: 44-47)。國家採取的強制性措施和政治動員對於成都的公共空間造成了極大破壞。雖然茶館商戶尋求各種方式生存，原有公共空間的式微在毛時期已成定局。這個情況一直到改革開放才有所改善。隨著「晚期社會主義」對於日常生活的鬆綁，小企業、娛樂休閒和商業文化的復甦，逐漸促進了公共空間的發展。

二、地方傳統文化vs. 國家

既有的中國城市研究很少關注文化問題，這兩本書試圖填補這一空白。如果茶館是成都民間社會最重要的公共空間，這個空間的興衰，又如何影響到地方文化的發展？對王笛而言，成都的茶館公共空間和文化實踐，是構成民間公共生活的一體兩面，缺一不可。茶館也是「精英和民衆、國家和社會之間在社會、文化、政治各方面衝突的舞台」（王笛 2010：29）。除了討論茶館的社會政治參與作用，這兩本書的另一個亮點是提供了理解民間大眾文化與國家關係的一個歷史視角。「國家怎樣控制社會和日常生活，」王笛寫道，「是20世紀中國一直存在的問題」（ibid.: 6）。在他看來，在國家推動的現代化過程中，民間文化或習俗的處境與國家和精英的態度脫離不了關係。這裡涉及國家如何在社會底層重建文化霸權和秩序的問題。晚清以來到國共兩黨交替執政，茶館所代表的舊文化被視為落伍的、阻礙現代化和西方化的（Wang 2018：93；王笛 2010：18），於是如何改造茶館的傳統文化習俗就成了國家治理方案的一部分，涉及複雜的、對民間社會的公私領域的監控、規訓及道德規範。20世紀初國家和精英開始以控制公眾娛樂作為干預日常生活的手段。例如，「20世紀初現代化運動中，地方精英運用像報紙這樣的媒體，『以落後及對共和秩序有害為藉口，無情地打擊茶館及其文化。』」（王笛 2010：29）。王笛想討論的是現代共和國成立之後，「舊社會的生活方式」如何被權力擴張的國家所治理(Wang 2018: 114)、如何被政治運動所吸納、如何反抗：

「隨著國家權力在茶館和日常生活中逐漸加強的角色，地方文化怎樣抵制現代化所推行的文化同一模式或國家一體化？」（王笛 2010：30）這兩本書的貢獻在於指出國家權力擴張如何在地方及文化層面產生作用。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在對日抗戰及國共內戰時期，國民黨政府「和其他各種社會力量利用茶館為其政治目的服務」（王笛 2010：14），包括把舊戲曲的內容納入愛國主義(ibid.: 398)。

王笛界定國家文化包含三個要素，「第一，是由國家權力來提倡和推動的；第二，有利於中央集權的；第三，有一個全國的統一模式。」(ibid.: 3)。而國家文化的推動又是和國家權力滲透到民間社會以及現代化的計劃結合在一起的。王笛顯然對此持批判的態度，認為國家權力的擴張對地方文化的「個性和多樣性」是很大的破壞(Wang 2018: 219)，「現代化使成都文化的獨特性逐漸衰弱」（王笛 2010：422）。然而茶館文化的變遷，不僅僅展示了地方文化的獨特性與國家文化的同一性之間的鬥爭(ibid.: 145)，還涉及國家政權與民衆之爭、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爭、中西文化之爭、以及內地和沿海地區的文化衝突(ibid.: 19)。在王笛看來，這是一場「有權無權之爭，即手中握有一定權力、代表國家話語的精英，向無權無勢的芸芸衆生施加文化霸權」（ibid.: 27）。即便如此，隨著國家權力深入社會底層、西化成爲主要思潮，地方文化仍舊頑強地在夾縫中尋找生存空間。

新中國成立後，茶館文化面臨的是全面的、革命性的衝擊。1949年後革命文化支配了文化生活(Wang 2018: 32)，政治運動席捲全國，對老百姓的生活方式與公共活動造成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革命及國家主導的政治滲透到民間社會的日常公私領域。這個時期的文化矛盾延續了精英與大眾的對立，只不過精英所仰賴的意識形態換成了社會主義，做法也更爲激進。王笛認為，共產黨滲透社會基層的能力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ibid.: 90)，傳統的大眾文化與生活方式面對社會主義式的現代化與工業化，成爲被主要否定和改造的對象。新政權一方面將草根活動界定爲「低級趣味」、「下流庸俗」（ibid.: 71），從中找出反革命、壞分子(ibid.: 81)，連小商家、員工和戲曲表演者都難免被貼上政治標籤(ibid.: 106)。另一方面，爲了達到現代

主義意識形態的要求、重建中國的政治文化(ibid.: 207)，善於利用文藝作政治宣傳的共產黨看到了民俗文化的作用，在1950年代開始積極建構服務工農兵的社會主義娛樂形式(ibid.: 61)，將戲曲等茶館民俗表演轉化成政治教育的工具。

王笛的研究顯示，中國的統治者對於地方文化的意識形態控制和治理有連續性(ibid.: 22)。在中國歷史上，「在茶館和戲園觀看演出並非純粹的娛樂，而是與啓蒙和國家政治聯繫在一起」（王笛 2010：128）。晚清時期，茶館內演出的地方戲是一種反映時政的表達方式，國家看到了這一點，便試圖利用大眾娛樂形式來「傳播正統思想和國家意識」(ibid.: 120)，具體表現在規定只能演出鼓舞民氣的歷史劇目(ibid.: 139)，或把政治主張、正統思想和價值觀灌輸在節目中，把「『新的』、『積極的』、『進步的』的情節加入傳統戲曲中，以『教化』民衆」(ibid.: 144)。新中國成立後，隨著國家權力進一步擴張，這個趨勢更加明顯。*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描述了共產黨接管文藝領域的過程，除了挪用傳統戲曲作為推廣革命文化的素材(Wang 2018: 89)，還包括一整套治理機制，像是管理單位和文化組織的設置，以及登記、僱傭、劇本審查、監控、產權轉移和稅收等手段。儘管這部分討論受限於史料，偏重政策實施、制度、組織管理，對於民衆的描述較少，但也讓讀者在微觀層次看到中國社會主義治理的方式和作用。然而，即便面對國民黨將茶館文化極力地邊緣化，以及社會主義的激進改造，茶館這個古老的傳統文化仍舊以非法的方式存活，沒有完全被政治運動摧毀(ibid.: 105, 110-1, 117)。事實上在1960年代初以前，雖然地方文化逐漸被同化，傳統跟革命文化仍舊並存，並未完全根除，其生命力之旺盛，也是王笛要強調的。

這兩本書最吸引我的地方在於展示了國家如何一步一步深入和干涉人們的日常生活、公共空間和社會關係，如何將地方文化及傳統納入國家的現代化及政治方案。作者的分析不僅提供了關於成都茶館變遷及都市轉型的描繪，更提供了一個理解20世紀中國內在文化與政治邏輯的樣本。確切地說，他的分析揭示了地方文化與國家的動態關係，以及國家權力形塑公共生

活及地方文化的歷史過程。在他看來，「改良和控制茶館的過程，是城市現代化和尋求身分認同的一部分」（王笛 2010：421）。有別於主流的宏大歷史敘事，作者所強調的在地觀點、民衆和日常文化的自主性，以微觀視角揭示了民間社會的公共空間、底層民衆與大眾文化的關係，與文化研究的興趣有共通之處。⁶他的分析讓我們看到文化與政治的共生關係，以及國家在文化發展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具體表現在都市公共空間與日常文化被吸納到國家霸權建構的過程。⁷對於《文化研究》的讀者來說，這兩本著作對於了解當代中國歷史、政治、社會與文化變遷，應當有所幫助。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Rowe, William T. (羅威廉) 著，魯西奇(Lu, Xi-qi et al. [trans])等譯。2008(1989)。《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衝突與社區，1796-1895》(*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北京(Beijing)：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江溶等譯(Jiang, Rong et al. [trans])。2005(1984)。《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與社會，1796-1889》(*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北京(Beijing)：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王笛(Wang, Di)。2009。〈新文化史、微觀史和大眾文化史——西方有關成果及其對中國史研究的影響〉“Xinwenhuashi, weiguanshi he dazhong wenhuashi - xifang youguan chengguo ji qi dui zhongguoshi yanjiu de yingxiang”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Microhistory and Mass Cultural History: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from the West and their Impact on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近代史研究》*Jindaishi yanjiu*[*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1:126-140。
- 。2010。《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Chaguan: Chengdu de gonggong shenghuo he weiguan shijie* [*The Teahouse: Small Business,*

6 除了本文介紹的兩本書，王笛還專門研究了秘密社會組織「袍哥」在民間社會的治理及清末革命起到的作用，見：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7 關於文化如何被國家工具化來打造主體，見Wang(2001)。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北京(Beijing)：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2018/03/26。〈王笛：對我最有啟發的幾本書〉“Wang Di: dui wo zui you qifa de jiben shu” [Wang Di: Books that Inspire Me Most]，〈閱想網〉*Yuexiangwang* [*Thinkread*]。https://www.thinkread.com/reading/9671。 (accessed 2019/3/22)
- 。2018/11/05。〈王笛：一些歷史學者根本沒把人民放在眼裡〉“Wang Di: yixie lishi xuezhe genben mei ba renmin fangzai yanli” [Wang Di: Some History Scholars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People]，〈近代史研究通訊〉*Jindaishi yanjiu tongxun* [*Newsletter for Modern History Studies*]。https://501364.kuaizhan.com/85/81/p570421026228d4。 (accessed 2019/3/21)
- 金觀濤(Jin, Guan-Tao)、劉青峰(Liu, Qing-Feng)。2003。〈紳士公共空間在中國〉“Shenshi gonggong kongjian zai zhongguo” [Confucian Public Sphere In China]，〈二十一世紀雙月刊〉*Ersbiyi shiji shuangyuekan* [*Twenty-First Century Bimonthly*]75: 32-43。
- 鄧正來、J.C.亞歷山大編(Deng, Zheng-Lai and J.C. Alexander ed.)。1999。《國家與市民社會——一種社會理論的研究路徑》*Guojia yu shimin shehui - yi zhong shehui lilun de yanjiu lujing*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A Social Theory Approach*]，北京(Beijing)：中央編譯出版社(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魏偉(Wei, Wei)。2007。〈城裡的「飄飄」：成都本地同性戀身分的形成和變遷〉“Cheng li de ‘piaopiao’ : Chengdu bendi tongxinglian shenfen de xingcheng he bianqian” [“Piaopiao” in the City: The Emergence and Change of Homosexual Identities in Local Chengdu]，〈社會〉*Shehui* [*Society*]27: 1-31。

二、英文書目

Wang, Di. 2018. *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 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 1950–200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ang Hui et al. 1994. “Is the Public Sphere Unspeakable in Chinese? Can Public Spaces (gonggong kongjian) Lead to Public Spheres?,” *Public Culture* 6(3): 598-605 °

Wang, Jing. 2001. “The state question in Chinese popular cultural stud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2 (1):35-52.